

第一节 从《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跋看华人、西士的观点异同

《女俗通考》首卷中登入了林乐知序、龚心铭序、任廷旭序、范祎书后，末卷中登载了龚心铭的跋。在《万国公报》上除了转载上述序言、书后和跋以外，还登入了龚的另一篇《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再跋》。对同为龚心铭所做的三篇序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龚前后行文的不同，他所做的调整及其背后的原因。而对《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①六篇序跋的比较分析，可以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窥见以上四位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作者对同一文本及相关问题的不同立场和观点，进而反映出晚清华人、西教士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不同侧重和规避。

一、对《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言的比较分析

这六篇序跋都或多或少涉及对林乐知和他的《女俗通考》的评价。这与林序中的自我表白相互呼应。林序首段就有“……而尤不能一日去诸怀者，则唯此振兴女学。释放女人……区区之心，不能自己。迄于今起视中国之闭塞如故，妇女之低微不改，而鄙人则已心力交瘁，不但舌敝唇焦，须发皓如，即笔端亦为之屡秃矣”“鄙人寓华已久，自忘其为旅客，颇切同舟惧覆之忧，本书之辑，其能已乎”，序末又重申“兹偕任君保罗，同译此书三年之久。寒暑无间，亦自谓心力交瘁”“书成将付剞劂氏，谨志数语于简端。世有知余者，以余之言策

^① 以往在《万国公报》和《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研究成果中，未见对该六篇序跋的关注和比较分析。

彼之行。中国庶有豸乎？而仆等三载之苦心，亦不至付诸流水矣。世无知余者，余亦唯自尽其爱人如爱己之心而已，于余何损哉？于人又何求哉？”林对自己中国文化身份的强调和对西方文化身份（包括传教士身份）的弱化、对中国情结的表白，一方面说明他采用文化适应策略，通过声明他的善意和归属感来减少华人排外的阻力，为进一步的宣传开辟道路；另一方面说明林等晚清传教士在华的言行受到华人和本土文化的制约，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调整和妥协，对其西方文化身份，尤其是传教士身份的有意规避证明了这一点。林乐知在其以华人为读者对象的著述译论中基本上都是沿用这种“一心为华、爱华一不辞辛劳一同舟共济”的表述模式，但这一点在其以西人为读者对象的演讲和对母会的汇报中则反过来，中国文化身份和中国情结被淡化，彰显的是其西人、西教士的身份。这种做法在晚清传教士群体中具有代表性，同时，在华人的文中也得到呼应，如龚心铭将林乐知与中国儒家士大夫形象联系起来——“先生以美洲名儒，作中华之寓客”“非古侠烈丈夫，安能有此热肠哉”。任廷旭序中“余师来华后之生平，四十余年中，无日不以开通民智为己任矣”是重复林序中的自述：“鄙人寓华四十余年，无日不以当行之正道，引导华人，亦无日不以当开之民智，启迪华人。”^①

林乐知和任廷旭虽然在报馆中是馆主和助手的关系，在编译时是主笔和笔述者的关系，但在彼此心理认同上是师生关系。如林序中，“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介粤东唐景星观察，从学于余”。又如任语：“然余自登师门，以文字结知己缘，二十年来，浑如一日。”任对林的谦卑、恭敬的言辞，“书成，命余略抒己见，以开简端，余何知哉”“从兹受撰序之命，穷年余师乃真知余者，余何敢以不文辞哉。唯是书之

^① 林乐知.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M]. 任保罗, 译. 上海: 广学会, 1904.

关系及其功用，余师自序中，已详哉，其言之矣。余又将何言乎”。^①任在其 1 150 字的序言中，9 次以“师”相称，5 次使用“命”表达对林意见的敬重。这种师生关系的定位也在范文和龚文中得到印证，如范文中“自去年游于先生之门，夙闻绪言”，又如龚序中，“铭从学于先生，历有年矣”。林乐知在著译报端以师自居、以功自居塑造自己“师”的形象促进了这种师生关系的建立。他对自己资历、经历和贡献的介绍也服务于此。例如，林序开篇中的“回忆生平，在华播道、讲书、译书、撰报，区区之心，不能自己”。又如序末中“鄙人寓华四十余年，于中华女俗知之较悉，生平环游地球，已历三次，于万国女俗亦略能言之”和“以余之言策彼之行”“竭三年之功，成百万之言，……自不得不以功归己，而无掠美之嫌矣。鄙人之辑此书，亦犹是也”“其裨益中国者，必非浅鲜；其裨益中国女人者，更非浅鲜矣”。^②与林乐知等广学会传教士借助报端著译在读者心目中塑造“师”的形象相应和，与传教士关系过密的华人也在文中不断强化这种师生关系，如任廷旭“余维中国华文日报之兴，实创始于余师所撰之万国公报。今此报仍在余师之手中”。龚称“(林)传道讲学，垂五十年，所译各种有用书，久已风行海内”。^③因而，这种“师生关系”的建立，除了源于中西强弱之势的差距、华人对西学的渴求、传教士拥有西学优势等特定历史因素外，传教士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华人在报端著译中的相关表述也是建构“师生”形象的一个因素。

在林序和任序中都有对任廷旭的相关介绍，对比两篇序言，可以看到作为传教士的林乐知和作为华人基督徒的任廷旭对留洋和信教的显化和隐化的不同处理。林乐知对其华人合译者的介绍是放在序言最后一段，由编译的文笔风格的介绍引出，“但能识字者，亦皆能读

① 林乐知.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M]. 任保罗, 译. 上海: 广学会, 1904.

② 同①.

③ 同①.

之，所以能成此善本者，则由于任君保罗助译之功居多也”。此处“任君保罗”下有两行小字“原名廷旭，信道后更今名”，这和后面的“近复笃信真道，悔改更名”一起强调了任廷旭改信基督教的事实。不同于林在序中未提及任廷旭，任在序首就提到自己和林乐知结交的经过，“然余登师门，以文字结知己缘，二十年如一日”^①，整个序言，任廷旭只字不提基督教及其皈依西教之事，而是以文字缘、言志、“随办译务”等来说明他和林乐知的结识和关系。

另一点是对被派出洋事实的不同书写，林序中：“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奏调出洋，前赴美京，因得以游览亚洲新兴之日本国及美洲最有声望之合众国。”而任序中：“岁辛卯，崔惠人钦使，奏调赴美。婉辞不许，手书敦促。遂于次年出洋供差。”^②林乐知的叙述是任廷旭主动奏请出洋。而任廷旭的叙述却是他再三推辞不过，在朝廷催促下不得不应付“供差”。为什么任淡化或规避他皈依基督教和出洋经历，而林彰显这方面内容？两篇序言的撰写时间均是1903年，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依然存在，任廷旭作为华人基督徒是有顾虑的，不愿吐露自己教徒身份和留洋经历。而林乐知站在传教士的立场上，义和团运动后试图改变华人对洋教洋人的抵制，借用任廷旭皈依基督教和出洋的事实向读者展示华人知识分子对西教、西方的认可和向往。与1903年的序言不同，任廷旭曾在1900年5月第136册《万国公报》上刊登的《读中东战纪本末三编谨跋其后》介绍自己的游美经历和从师经历，“仆也，幼习儒书，长耽西学，（曾从先生指授英文拼法三月）自随使美邦，派驻其华盛顿都城，得亲观美洲新国之政俗。由其开化最迟，故无他国祖传之恶习。且凡欧洲各国，屡经试验，……善政善教，莫不措正而施行。公馀流览，心向往之”。^③为何这篇发表在义和团

① 林乐知.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M]. 任保罗, 译. 上海: 广学会, 1904.

② 同①.

③ 任廷旭. 读中东战纪本末三编谨跋其后 [J]. 万国公报, 1900 (136): 19276-19278.

运动前夕的序言对留洋经历就没有 1903 年序言的闪烁其词？反而直抒“善政善教……心向往之”的欣羡之情？这与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舆论压力不无关系。

另外一处，两篇序言都提及任廷旭的“志”，但侧重点不同。林序中提到“回华之后，摒弃世俗，专勩余在广学会译书，以寄其绝世牖民之意。十年来如一日。近复笃信真道，悔改更名，仁君之志趣远大，可想见矣”。从“以寄其绝世牖民之意”到“仁君之志趣远大”都为说明基督教对任廷旭立志的作用。然而，任序中的表述却与此有出入，“初谒余师，即命余言志，余以求知对，师颇违之。盖余年逾而立，始发愤改习英文，本无见用于世之志也”。^①任廷旭弱化其济世救民之志，以求知、无用世之志说明自己修身遁世而不是一心入世的价值取向。

由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任廷旭序言中对其信教、出洋、济世都与林序中的表述不尽相同，而且从“余师序中，已详哉其言之矣，余又将何言乎”可以推知，任廷旭是在看过林序后作的该序。这样一来，其序中对以上内容的相关声明很可能是针对林序而做的修正，是任有意借作序之机对林序中不合己意的地方进行自我申辩和修正。林和任各自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对任的信教、出洋、济世的不同叙述角度，说明了传教士和华人合作者之间共识与分歧、调和与规避共存的关系。

对中国时局的判断和描述，林和任也有所不同，林较悲观甚或危言耸听：“岂非仍如寒冬之冻云凝结，坚冰不解，永无望有春回水泮之时乎”“中国事变虽多，而时局日非，觉今日之关系较诸往昔实为更大更险”“（鄙人）……颇切同舟惧覆之忧”。而同登在《万国公报》和《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的任序对时局形势持乐观态度：“然自

^① 林乐知.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M]. 任保罗, 译. 上海: 广学会, 1904.

互市以来，五洲通道，万国来盟。……华人之耳目，始为之一新。立约通商以来，华人之游历外洋者，或为外交官职，或为留学官生，或为巨商大贾。比其返也，又各采其闻见，以饷遣其国人”。^①虽然上述二语都旨在由此得出“与人比较以求进步”的结论，但一悲观一乐观，进而求变的迫切程度不尽相同。这缘于以林乐知为代表的广学会传教士比任廷旭有更深一层的表述目的——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这就不能停留在局势好转的层面，而要深层地动摇和取代传统信念，要从否定和批判开始。任廷旭虽为华人基督徒，但改变中国信仰的初衷不见得比救国强国的目的强，而林乐知等传教士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中国成为基督教国家，变法强国是为之服务的，这就造成二者在不同目的下，产生不同的书写策略和叙述方式。

虽然林乐知和任廷旭都将《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与强国兴国联系起来，但是两人的期望和目标有所不同。任廷旭表达了“安见中国美大之山河，不能与东西各强国抗衡乎？此余师辑书之苦心也”的目的，而林乐知只表达了“安见其不能成功乎”的确信。可见，任廷旭的民族对立意识更强，以中国与日本、欧美强国相抗衡为目的。而林乐知以其西方文化传播者的身份，弱化中西间的对抗，更强调中国自身的进步、自强即为成功。林的其他著述译论也至多涉及中国追赶西方，至与其并驾齐驱的前景，而没有见到他期望中国与西方抗衡、更胜一筹的表述。因此，任语中的“安见中国美大之山河，不能与东西各强国抗衡乎？此余师辑书之苦心也”，实则是任而不是林的期待，是任借林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渴求。由此可见，华人和西士基于各自不同的身份，对中国自强设定了不同的目标。

^① 林乐知.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M]. 任保罗, 译. 上海: 广学会, 1904.